

社会资本与近代家族企业家政治关联活动

——以刘鸿生为中心的讨论

姚清铁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政企关系一直是近代中国企业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近代民营家族企业家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本文以1932年国民政府邀请实业家刘鸿生担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一职这一事件为中心,分析事件中家族企业家的身份转变,讨论刘鸿生如何借这一机会与国民政府形成政治关联,以达到获得政府“支持之手”,并试图阻止政府的“掠夺之手”。这一事件终因国民政府不够强大而不能给予刘鸿生足够的政治支持而告终,而刘鸿生也在施行了系列改革之后,黯然辞职。

关键词: 刘鸿生; 家族企业家; 社会资本; 政治关联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5)06-0012-07

一、引言

政企关系一直是近代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在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中,政府无疑扮演着资源配置的中心角色。如果将企业看作是生产资源的组合,那么企业资源的异质性、资源的不完全流动性、对竞争的事前和事后限制能力则可以为企业提供持续的经济租金^[1]。这其中的社会资本是源自社会网络、可通过网络获得并嵌入于网络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2]。社会资本既是企业成员最能为企业做出贡献的资源,也是保持企业运作弹性的一种资源。政治关联是企业的关键人物通过在政府任职等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3],通过构建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等各种便利^[4]。在现实经济中,这种关联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以国有企业之名行私营企业之实;二是通过行贿等手段拉拢政府官员达到自我保护;三

是聘用政府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或者企业领导人直接通过获取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来获取政治身份^[5]。

在政局动荡,充满不确定性的近代中国,我们同样观察到了不少的家族企业政治关联案例,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件便是1932—1936年家族企业家刘鸿生在南京政府国有轮船招商局的任职事件。刘鸿生在招商局的任职把一个家族企业家和一个国有企业联系在了一起,刘鸿生的身份也从一个家族企业家变成了政府雇佣的经理人。对于近代轮船招商局,朱荫贵做了较多的开创性研究,朱荫贵的分析聚焦于近代中国航运事业^[6],而对于刘鸿生,已有的研究则较多地集中在刘鸿生经营的家族事业本身,且研究焦点分散,对于刘鸿生个人身份的分析并不多见。本文的讨论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回顾1932—1936年刘鸿生在招商局任职事件始末,分别从国民政府和刘鸿生的角度讨论这一事件的发生原因,分

收稿日期: 2010-09-18

基金项目: 201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L015)。

作者简介: 姚清铁(1977—)男,江苏盐城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家族企业、企业史。

析各方在其中的行为动机,并试图总结这一身份转变事件对各方的影响。

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南京政府为何选择一位非官僚身份的“体制外”家族企业家来管理自己的事业;二是作为已经完成创业的刘鸿生在其事业全面开花、分身乏术的情况下为何会选择接受这一任职邀请?

二、政治关联的前奏:刘鸿生的拒任

刘鸿生正式接任招商局总经理是在1932年,而此前,国民政府已经数次邀请刘担任该职,均被婉拒。下面首先分析刘鸿生拒任的原因及背景。

首先要从招商局的国有化开始谈起。1930年,作为中国官办的最早的现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经历官督商办和商办隶部之后,开始进入国有经营阶段。虽然直到1932年,轮船招商局才正式变为国有,但实际上,这一国有化的过程早在1927年就已经开始。

1927—1932年通常被称作招商局的官督整理阶段,在这一期间,有两件事颇为耐人寻味,一是1927年1月上旬,蒋介石令杨杏佛办理招商局事宜,杨以“内容不明,权限未定,未允就职”^[6]作出回应。而招商局董事会4月12日的特别会议的记录却表明“会长报告,昨日杨杏佛手持蒋司令暨交通部命令,率同接收到局,意欲即日接办局务,当经严词拒却……”^[6]。固若金汤如招商局,即使杨杏佛手持蒋介石手令也无人买账。二是1930年7月24日“总办赵铁桥因整顿局务遭忌,被刺身故”事件。赵铁桥在遇刺之前,于招商局所查办的三大案件之一便是积余公司舞弊案,而李国杰时任招商局董事长兼积余产业公司总经理(李国杰的另一身份是李鸿章长孙)。1930年负责清查积余公司舞弊案的招商局总稽核李孤帆后著有《招商局三大案》。蔡元培为该书题辞“招商局有数十年之积弊,非彻底明了决难着手整理”^[7],显然,招商局在经历若干年发展之后,沉痾积弊。这也意味着,收归国有之后的招商局对于新任的管理人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物色新的经理人,在火柴、煤炭和水泥各行业“不同的篮子里摆鸡蛋”的刘鸿生进入了候选视野。早在1929年8月,时任工商部部长的孔祥熙即致函开滦矿务

局“我们殷望台端对于刘君前来,不加任何留难”。而开滦矿务局总经理那森在回函中则并不情愿,只是“对于这项要求所根据的崇高动机,愿予注意。”而刘鸿生本人则很清楚“招商局积弊太深”,“第恐人不相谅,滋为怨府”,乃是非之地。

1930年8月,在赵铁桥遇刺之后,孔祥熙旧事重提,邀请刘鸿生就任招商局总经理,被刘再次婉拒,刘在函件中明确向孔祥熙表示“我无法就任招商局总经理的职务,虽然这有失蒋主席和您的期望。”然而刘鸿生心中早就明白“如蒋必欲强余出任斯职者,则以自身利害关系,亦无法推辞也”^[8]。

正如刘鸿生不接受这一任命也无法改变被任命的结局一样,招商局董事会的百般抗拒也无法阻止国民政府将其收归国有的决心。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85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将整理招商局的职责交给交通部。是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监督招商局章程7条,设立招商局监督办公处,隶属交通部,设监督和总办各一名。后又将“招商局监督办公处”改称“招商局总管理处”,成为招商局的最高权力机构。

1932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招商局收归国营令》,招商局改称“国营招商局”,直辖于交通部,纳入了官僚资本体系。招商局设理事会、监事会,实行总经理制,理事会理事由交通部选派。而作为总经理的刘鸿生则于1932年10月即已到位。自此,招商局结束官督整理时期,正式收归国有。

三、政治关联的过程:刘鸿生的接任

前面已经提到,招商局作为清政府设立的近代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到1932年国民政府接管时,已经连年亏损,而内部人员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收归国有的招商局依旧是困难重重,但国民政府对于病入膏肓的招商局的经营似乎并不在意。1933年3月,刘鸿生向招商局提出《整顿招商局计划意见书》,认为招商局的最大病症在于“负债过多,船龄过高,及栈码腐败三项”,要求政府拨款3000万元作为招商局的开办基金^[9],但无果而终。同年6月,刘鸿生又要求交通部拨款1500万元,也同样没有回音。尽管刘鸿生对招商局从人事到成本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但招商局的经营并没有显著改善,其财务状况如下表(表格1,货币单位均已折算为人民币元)。

表1 招商局主要财务指标(1932—1936)

年代	资本金(元)	盈利额(元)	华资银行新借款额(元)
1932	11748251	-2278190	2139009.78
1933	11748251	433708	0
1934	2973902	-1467795	2970000
1935	2973902	-2321700	NA
1936	2973902	NA	2165000

资料来源:1. 朱荫贵《1927—1937年的中国轮船航运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01期。朱荫贵:《从轮船招商局的债款看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 1934年后资本额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因1932年收归国有时按一套股票(航业股2股产业股1股)现银50两收购,到该年收购结束按新股股价计算之故。1936年利润数据因抗战案卷损失而无从查考。

从表格1数据上看,只以新增借款计,招商局的负债率也是很高的,但贷款的作用只是勉强维持招商局的运营,除了1933年略有盈利外,其余时候招商局都是亏损的,且亏损数额较大,年均均在200万元左右。1932年,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开始影响中国,但无论是拿同在航运业的民生公司运营(见表2)来比较,还是刘鸿生自己的事业中较为主要的华商上海水泥公司(见表3)的财务指标来比较,我们都可以看到,轮船招商局在这一阶段的运营并不理想。

表2 民生公司主要财务指标(1932—1936)

年份	资产总额(元)	盈利额(元)
1932	2885244	366512
1933	3835949	617404
1934	4974720	668491
1935	7308238	1174176
1936	9882260	2300177

资料来源:朱荫贵《1927—1937年的中国轮船航运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01期。

表3 华商上海水泥公司盈利额(1932—1937)

年份	销量(桶)	盈利额(元)
1932	436407	438298
1933	427607	543338
1934	481883	699780
1935	419557	64915
1936	598716	383700
1937	379641	384397

资料来源: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不只是国民政府对企业运营的态度,从企业主管任职更替,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并没

有对招商局寄予很高希望。自1927年酝酿收归国有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招商局外迁香港,招商局的管理人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这其中刘鸿生和遇刺的赵铁桥是任职时间比较长的,但即使最长的刘鸿生任职时间也只有三年多。

从企业本身的机构设置来看,国民政府也并没有给刘鸿生留有很大的施展拳脚的余地。收归国有之前商办的招商局确立的是“董事会会长负责制”,即三科长工作职责制。董事会下设主船、营业和会计三科,分别负责基础建设、处理和外国航业有关的事宜及商务业务。而刘鸿生任职之后的1933年,交通部颁布的《国营招商局组织章程》共65条,令招商局的管理结构更为扁平,但雇佣经理受到监事会和理事会的双重制约,权力被限制,并没有多大的自主权。

实际上,在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时候,招商局是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思想的体现,当时,南京刚刚成立,还没站稳脚跟,并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与此同时,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最关心的还是军费筹措问题,而在军费筹措上出力较多的首选是金融业,而不是工商业。政府在资金形式上也更关注公债的发行,而不是企业的运转。作如是观,南京政府即使有意贯彻孙中山的国家资本思想,按轻重缓急来分,也没有轮到把招商局这样连年亏损的企业摆在前列。

南京政府自成立后,每年财政都入不敷出,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即使是最底的1932年,也达到16.8%。1927年5月至1937年1月,南京政府共发行了24.12亿元的国内债券,这其中,银行家们无疑扮演了主角。据估算,上海各银行在1931年末拥有半数至2/3的南京政府公债与库券^[10]。在这个意义上,说话更有份量的是上海的银行家们,而不是企业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的观点有二:一是国民政府有想使招商局运营好转的初衷。若非如此,不会找来能干的刘鸿生做总经理,招商局的监事会也是社会贤达济济一堂。当然,招商局此时的这些职位带有荣誉色彩,民族资本家们借这个名义与政府拉近了关系,政府也借这个名头笼络了民族资本家。二是国民政府对于改善招商局经营的愿望并不强烈。表现在行动上,既没有给予招商局以资金支持,也没有给刘鸿生以很大的权

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政府对于作为“体制外”的经理人的一种控制。1936年招商局又改组,取消监事会,不过刘鸿生也辞职了。

四、政治关联的分析:刘鸿生的任职

周其仁认为,企业家才能分为两种:一是一般性的企业家才能,即投资和经营决策的能力,二是制度企业家的才能,也就是实现“制度与组织创新”的能力。对于第二种能力,企业家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体现^[11]。这种社会资本的构建也是买办出身的刘鸿生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的。在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并实力渐强前,刘鸿生并没有将很多精力放在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构建上,这一点也可以从刘鸿生刚开始两次婉拒孔祥熙的任职邀请中看出来,刘鸿生对于招商局的任职是回避的,但他最终还是接受招商局的职务。对于刘鸿生来说,之所以接受招商局的职务,本质上应当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政治关联寻求政府的“援助之手”,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政府“掠夺之手”对他的伤害。因为邀请他的宋子文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人物。

(一) 政治关联与政府的“援助之手”

从“援助之手”的角度来分析,刘氏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给他的企业带来支持:

1. 更多的融资机会

刘鸿生任职招商局的时候,正是刘氏企业逐渐步入紧张困难的时期,刘鸿生在回忆中说宋子文“一口允诺我在企业上一切问题由他包下来”^[12]。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在刘氏企业融资困难的时候,与刘氏企业来往较密的银行主要是浙江兴业银行和四明银行。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招商局的往来银行中,四明银行的往来业务也比较多,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这两家银行都是非官方背景的商业银行,虽然四明银行1934年因为周转不灵被收归国有。

刘氏对政府的融资期待仍然是有迹可循的,1935年11月,刘鸿生与荣宗敬、郭顺、聂潞生向蒋介石呈“请求政府救济实业请愿书”,其中提到:当此政府财力集中、信用已树之际,亟宜筹设特种金融机关,由政府主持其事,略仿各国工业兴业或劝业银行之制度,专事救助实业^[13]。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立拔巨款救助事业。显然这一吁请并未奏效。若无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则

压根不能指望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有请求援助的呼吁渠道,直到1936年刘鸿生去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政治关联在关键时刻,给刘鸿生的企业事业带来雪中送炭的支持,尤其是1935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白银法案导致上海工商业普遍萧条的时候,刘氏债主上门,天天过年三十,这时他向宋子文求助,被宋拒绝并加以嘲讽^[14]。

2. 希望在政府的政策制订方面可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20世纪30年代刘鸿生的实业,既要面对来自国内竞争对手的压力,又要面对国外竞争对手的压力,这些压力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背景下有较为充分的体现,作为家族企业家的刘鸿生无疑希望能够在政策层面得到政府的支持,这可以从刘鸿生经营事业里比重较大的火柴业里看出一些端倪。

以火柴行业为例,1931年,在刘鸿生的一再要求下,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关税从7%提高到40%^[15]。1934—1935年,面对国内同业竞争和日本火柴侵入,以及雪上加霜的市面萧条,大中华火柴公司巨亏,刘鸿生希望用同业联营的方式,以政府的行政手段“限制生产”、“取缔私货”、“集中发卖”^[16],这次仍然以行业公会中华全国火柴联合会的名义向财政部提请,在“漏税火柴可予杜绝或大大减少,而火柴统税亦大可增加”的诱惑下,财政部于1936年1月18日批准了火柴业同业联营的请求。火柴业的联营相当于行政手段构建壁垒,从而形成行政垄断。联营之后的火柴明显上升,1937年3月1日,大盒(甲等)火柴价格为48.78元,而1935年10月11日,每箱仅36.6元,上升了33.28%。应当说,促成政府最终将企业家的意愿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刘鸿生如果没有与国民政府的交好是无法做到的,而在招商局的任职则可以视作他与政府交好的一个途径。

在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方面,除了第三种任职外,刘氏所采用的手段显然要更为丰富,1935年2月,刘鸿生向孔祥熙的“明德堂”租住上海大连湾路的栈房,付出好几万的租金,而房子则只是空置的^[17]。显然,这是第二种直接的收买与行贿了。前面我们刚刚提到1936年初财政部同意火柴统制,这两者有无因果关系无从考证,但

它们的确实发生了。

3. 希望借政府的“扶持之手”平息工人罢工运动

1927年3月,国民党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共产党组织的上海15万工人大罢工令整个城市瘫痪,工厂停工,所造成的损失是实业界所不愿意看到的。实业家们对罢工是比较头疼的,1930年大中华火柴工厂在工人进厂的口试考题里即有“入过党吗?”和“入过工会吗?”^[18]等题目。即便如此,1930年7月,上海荧昌火柴厂仍然发生了因为“退职金”导致纠纷的罢工,致“损失颇巨”,后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拨派武装警士若干名赴该厂”才得以平复。显然,缺少政府的支持是做不到工厂的平稳生产的。

4. 为刘氏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

举例来说,1931年,刘鸿生为了降低经营的成本,成立顾丽江采办事务所,“集中办理各公司之采办事项”,这一机构除了采办刘氏企业有关原料之外,也办理其机关、工厂的物件。在1934年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采办所兼代轮船招商局、航空委员会、航空学校等机构的物料,700万的营业额中,刘氏企业占了500万,而招商局等主顾则占了200万。招商局委托该处代办货物后,每月津贴费用1000元^[19]。近水楼台先得月,刘鸿生通过自己的采办所购置招商局的原料,一方面降低了成本^[20];同时,也为自己经营的事业提供了利润来源。当然,这一做法也是被怨嫌的,因为各企业都想自己从采办中得外快。

(二) 政治关联与政府的“掠夺之手”

从政府的“掠夺之手”来说,刘氏希望他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可以抵御政府对其的伤害。政府对其私营实业的伤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税”,二是“公债”。

1. 希望政府降低“统税”

对于“统税”,20世纪30年代刘氏所经营的主业,不管是火柴还是水泥,均遭受了国民政府越来越重的统税征收,前文提到,刘氏企业在与政府商讨“反倾销”日本水泥及“建立火柴统制”时,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可以增加政府的统税来源。

以水泥业来说,1931年2月1日,水泥统税增为每桶0.6元,1933年12月5日增至1.2元

每桶,中华水泥厂联合会于是“难于维持”,曾要求财政部“念民生之困敝,实业之艰危”而“收回成命”,而到了1937年4月2日更增至1.5元每桶。显然,这种吁请是没有效果的。

2. 努力减轻国民政府“公债”对刘氏实业的影响

“公债”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家的巨大影响在小科布尔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与讨论。单举一例,1932年“整理公债”使国民政府省了8500万至10000万元的公债付款,而1932年国民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68300万元^[21]。刘鸿生曾经若干次请求国民政府维持债信,比如1931年在“工厂法”实施讨论委员会中他代表工商界发言,要求国民政府“不再滥发公债”^[22],结果自然是未能如愿。

即使是不能抵御这样的伤害,刘鸿生仍然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法构建自己的政治关联。前文提及的第三种政治关联,如果按照强弱程度,又可以分为从政经历(强)和参政身份(弱)。研究表明,在“差序格局”社会,企业家的从政经历可以为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参政身份则不具备这样的功能^[23]。因为从政经历具有“嵌入性”,而参政身份只具有“市场性”,后者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一种市场交换。

刘鸿生在招商局的任职从分类来说属于政治关联里的参政身份,而不是从政经历。实际上,刘鸿生自其创业开始,就有着若干社会兼职,既有校友会性质的“梵王渡俱乐部”,也有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华董。总体来看,早期的社会兼职与国民政府有联系的并不多,这一方面缘于刘鸿生的买办出身和商人身份,又从某个侧面说明即使是到20世纪30年代,刘鸿生的重心仍然在同学和商界网络。但从其社会兼职来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除了租界的资源之外,刘鸿生开始重视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关联,比如1932年,他被聘为“国民党政府全国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

归纳起来,刘鸿生的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了政府的“扶持之手”,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似乎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成为民营企业的有力的“扶持之手”;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这种政治关联却也没有能够有效阻止政府的“掠夺之手”,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刘氏

家族企业的伤害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政府力量的强大,刘氏对政府的政治关联的关注程度却是与日俱增。

实际上,1912—1927年军阀混战为中国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政府的统治能力下降,中国的商业进入了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相应地,社会资源更多地掌握在商界而不是政府的手中。而1928年以后进入训政时期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社会资源的中心逐渐向南京政府手里集中,这一点从1929年上海总商会被新的大上海商会取代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1932年6月整理公债事件更意味着政府手中的资源变得粘稠^[21]。“识时务者为俊杰”,刘氏选择出任招商局或许是已经嗅出了一些这样的社会资源此消彼长的变化。

五、政治关联的结束:刘鸿生的离任

1932—1936年刘氏在招商局的任职可以看作一次被动的家族企业家的政治关联活动,而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给刘氏带来足够多的利好。在刘鸿生的整饬下,招商局虽略有改观,但积重难返。缩减人事,控制成本无不意味着利益的重新瓜分,这其中便包括对俞飞鹏妻弟的解雇。不只如此,刘氏在招商局的任职为开滦矿务局解除合同提供了机会,1934年,开滦局提出解除与刘鸿生的分组合约,而此时,刘氏的企业日渐艰难,开滦局的合约不仅是刘氏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他维持了在上海金融界的信用,这一事件虽然最终以维持合约结束,仍然牵扯了较多精力,经过1935年的极度困难,向政府求助无门,再加上俞飞鹏在1936年担任了交通部长,1936年2月,刘鸿生辞去招商局职务,集中精力挽救自己家族事业的危局。

1932—1936年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实力渐强的过程,经过对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侵蚀,逐渐控制了上海金融界并进而向实业界弥散。这也昭示着社会逐渐变得政治权力中心化,工商实业逐渐沦为政治权力依附的一个过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以被动的姿态进行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关联也体现了刘氏敏锐的商业嗅觉。

1932—1936年对刘鸿生来说,是一次被动的政治关联过程,尽管它并没有为刘氏带来可观

的社会资本以帮助他轻松度过1935年的经济萧条难关,但它可以视作一个家族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其家族事业回报之间回馈的一个样本,叠加在上海商界势力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尤其显得苍白。

1932—1936年对于轮船招商局来说,是一家族企业家以自己的视角整理改革一个积年基业的尝试,虽然刮来了一股新风,但终未能使之脱胎换骨。而国有化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国有化的一个前兆,实际上,不只是招商局,刘氏自身的家族企业最终也没能逃脱官股渗透的命运。

参考文献:

- [1] Perteraf M A. The Cornerston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A Resource Base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3): 179-192.
- [2] Lin Nan.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 [3] 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1): 369-386.
- [4] Shleifer A, Vishny R. Politicians and Firm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4): 995.
- [5] 张维迎. 产权、政府与信誉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43-152.
- [6] 朱荫贵. 1927—1937年的中国轮船航运业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1): 37-54.
- [7] 李孤帆. 招商局三大案 [M]. 上海: 现代书局, 1933: 3-8.
- [8]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03-308.
- [9] 张后铨. 招商局史(近代部分) [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 428.
- [10] 李紫翔. 中国的银行之特质 [J]. 东方杂志, 1933, 11(1): 35-36.
- [11]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 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J]. 经济研究, 1996(6): 71-80.
- [12]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08.
- [13]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6.

- [14]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6.
- [15]青岛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210.
- [16]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08.
- [17]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11.
- [18]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54.
- [19]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1-13.
- [20]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2.
- [21][美]小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M]. 杨希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72.
- [22]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5.
- [23]李孔岳, 谢琳, 宋丽红. 企业家从政经历、参政身份与高壁垒行业的进入[J]. 学术研究, 2012(12): 74-160.

(责任编辑: 黄明晴)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Owners in Modern China: a Case from Liu Hong Sheng

Yao Qingtie

(School of Economics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Nanjing 210023 , China)

Abstract: Soon after its taking 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back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China invited Liu Hongsheng, a famous family business owner in Shanghai then to work as the general manager to change its condition of suffering from a loss. This paper, however, focuses on such an employment to find out how Liu's political connection activities work, its reasons, and how did it try to get th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while trying to prevent his own family business from being robbed by the Republic Publ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 final result turns out to be that the support through such a political connection was quite limited as the social capital was not strong enough, while Chinese Merchants didn't change much as its problems was too much to be changed.

Key words: Liu Hongsheng; family business owner;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onnection